

学术专论

御制《盛京赋》与清代政治文化 ——以《盛京赋》的发布、 传播与阅读为中心

张一弛

【摘要】乾隆八年，皇帝东巡谒陵，撰《盛京赋》，将“盛京”这一地理概念从三个方面与清代政治文化相联系：优厚的自然条件，象征着大清得自天眷；淳朴的社会礼俗，展现着满人道德风尚；肇基建都的历史，启示后人不可“忘本”。继而，皇帝通过行政体系与文教组织的渠道制造、传递诗册，促使臣僚阅读。在传阅《盛京赋》的过程中，读者的关照不仅在于文学品鉴，更在于政治意涵。整个过程展现出盛清朝廷影响精神世界的渠道和能力。

【关键词】盛京赋 东巡 商业出版业 阅读史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8)-01-0037-16

“政治文化”指特定时空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与意识，是一国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政治权威的构建，是国家政治机器得以运行、统治精英得以凝聚的原理所在。举凡中国历代强大王朝，几乎都将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完善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①具体到清代，特别是在“乾隆盛世”中，清高宗以“敬天法祖”为口号，同时从上天受命、祖宗统胤两个角度汲取政治合法性，并将这两个概念与清王朝起源史事、满洲传统习俗、汉人儒学思想和文词书写等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②这是清朝能够成功统治广袤国土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17-05-10

【作者简介】张一弛（1988-），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ye_zhang@ruc.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14ZDB038）成果。

- ① 关于“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起源，可参见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1-29. 对于这一定义如何与中国史研究相结合，前人已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讨论，可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页；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 ② 关于盛清政治文化的内涵，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有所涉及。例如，刘凤云通过对帝王治国术的分析揭示出皇帝个人意志对国家文化权力的形塑。林存阳通过对乾隆初年三礼修书馆的研究指出“崇儒重礼”等文化因素对国家凝聚力的巩固。张勉治（Michael Chang）通过对乾隆时期南巡的分析，将高宗时期政治文化归结为：重申满洲旧俗，展示皇家气派，申说开国历史，巩固臣民对清朝政权的忠诚与向心力。见刘凤云：《“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0—178页。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14-33, 160-217, 219-258.

之一，余荫直至今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这一政治文化构建并非朝夕之间通过一纸命令完成，而是通过多种方式、经历了许多具体历史过程，在“自上而下”的推行与民间对官方的呼应中才得以实现。这些具体机理，常常不为人们所知。近距离观察盛清时代涉及政治文化建构的事件与举措，对于理解清朝文化政策的手段与意义，进而明晓统治者如何提升国家凝聚力，都不无裨益。

本文即通过剖析一个微型历史事件——乾隆八年（1743）《盛京赋》的创作、传播与阅读——来考察乾隆时代政治文化建构的方式及意义，思考清人如何通过文化传播的媒介绘制政治文化的图景。仅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盛京赋》只是一部御制诗赋体裁的文学作品，然而这一文学作品的写作背景承载了清朝皇帝以“盛京”作为符号书写“敬天”、“从俗”与“法祖”的政治文化，具有特殊意义。^①不仅如此，在诗赋创作之后，皇帝将其制成数种图书，并且在具有政治属性的渠道中进行分发；不同的读者读到书册后，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这些都关乎政治文化的建构，体现了权力对观念世界的影响。近年来，围绕书籍流通与阅读的“书籍史”研究逐渐兴起，学界对书籍传播与知识接受这一“媒介的政治史”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②在这一视野下，通过考察这一附着了政治意义的文化载体的传播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乾隆朝政治文化构建的特殊性。

一、《盛京赋》的写作背景

《盛京赋》的写作背景，与清初“盛京”这一地理概念在政治文化中的印象变迁有着重要联系。在地理范围内，清人所谓“盛京”包括了两层含义：一层是盛京城，也就是清朝入关前的旧都；另一层则是整个盛京将军与盛京五部管辖区域，涵盖了东北地区相当广阔的地理范围。^③而从文化上，“盛京”则象征着“发祥之地”，是“敬天法祖”这一政治文化观念的重要寄托。^④

然而，将地域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并非骤然完成；相反，顺治元年（1644）清廷迁都北京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盛京这一地理概念在朝廷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并不显著，更谈不上政治文化的载体。睿亲王多尔袞奏请迁都时称：

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⑤

身处盛京的顺治帝乃遣官祭告盛京太庙：

顺众志迁都于燕，以抚天畀之民，以建亿万年不拔之业。谨告。^⑥

无论是多尔袞的奏言还是顺治帝的告庙词，都将燕京看作是新的“帝业所基”之处。这就意味着清王朝从未来的战略规划考虑，开始将统治重心全面从盛京投向北京。盛京百官绝大多数随同入关、来到北京，东北地区仅留镇守官等少数机构，行政机构大为削弱，乃至“人去衙空”^⑦。后虽设盛京五部及盛京将军等职官，但盛京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已大为下降。

① 关于《盛京赋》的政治属性，林士铉曾结合其满文本的释读作出了初步分析。见林士铉：《皇矣陪都，实惟帝乡——乾隆皇帝与满、汉文〈御制盛京赋〉》，《故宫文物月刊》第367期（2013年10月）。

② 关于书籍史研究中对书籍纂修、流通和阅读所附带政治意义的关注，可参见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等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7—76、145—166、181—192页；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③ 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④ 刘凤云：《奠都盛京：清朝入关前文化体系的构建》，《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⑤ 《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丁卯。

⑥ 《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癸巳。

⑦ 佟悦：《清代盛京城》，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伴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盛京的政治意义随即萎缩。^① 盛京太庙祭祀的变化颇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清廷政治文化视野中盛京的地位。盛京太庙营建于皇太极称帝之时，^② 奉清朝四祖（肇祖、兴祖、景祖、显祖）之祀。但太庙并非仅是奉祀皇帝先人的文化场所，更是文化与政治的联系纽带。先前，正白旗备御刘学成提议建设太庙，称：

我汗既为天地宗子，须要……把始祖神位入坛配享，道官唱礼，我汗当九升九奏。这便是天子敬天地的道理，朝廷当行的一宗要务。^③

太庙落成后，皇太极制定了繁复的祭祀典礼，^④ 屡于命将出征、奏捷凯旋时举行告庙仪式，这与刘学成的建议相合。可知该场所在清朝的政治观念中非常重要，君臣均对此有充分认识。

可是，在迁都时，清廷将太祖与太宗神位入奉北京太庙，改盛京太庙为“四祖庙”，专奉四祖。^⑤ 此后，盛京太庙的祭祀越发稀简，顺治二年（1645）尚有二次，三年和四年则各仅有一次，^⑥ 顺治五年则未遣官祭祀。是年冬，清廷重修北京太庙后，宣布“四祖入庙”，将四祖祭祀也移入北京。^⑦ 此后盛京四祖庙循例由地方官以时祭享，朝廷不再特加瞩目，从政治文化体系中淡出了。“盛京”这一地域概念在政治文化中渐趋边缘，这在宗庙祭祀变动中可见一斑。

然而，盛京的政治文化意义虽然遭遇边缘化，却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关外时期君主祖陵，即永陵（葬四祖）、福陵（葬努尔哈赤）和昭陵（葬皇太极），象征着清朝祖宗所在，未尝一移。固然，清初亦曾从制度上裁省三陵祭祀，从宗室常驻降为地方官员代办。^⑧ 但是在制度之外，圣祖多次亲赴盛京，展谒祖陵。特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平定，皇帝乃命次年谒陵，是为圣祖的第二次东巡。行前，皇帝曾密谕奉天将军安珠瑚，解释东巡谒陵的文化背景：

今……天下永归太平。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毕，复又祭告陵寝。盛京乃祖父初创根本之地，朕不时思念。现值天下无事，欲诣山陵致祭，亦未料定。朕前巡幸，未至永陵，至今悔恨。今若幸彼，必至祖辈旧址观看。^⑨

平定三藩凯旋，不仅要在太庙与社稷庙致告，也要告祭盛京陵寝，事实上宣告了清朝寄托祖先敬仰与群体身份记忆的场所，不只在在于北京，也在于盛京。这是盛京与清代政治文化之间联系的重要确认，也是清朝统治者重新构建“盛京”观念的一个重要起点。圣祖三次展谒盛京祖陵，世宗也曾于雍正四年（1726）密谕盛京将军噶尔弼为来年谒陵作准备，不过未能成行。^⑩

清高宗即位后，恢复了东巡盛京、展谒三陵的活动。终其一生，四诣盛京，较圣祖为多。高宗对谒陵活动的意义亦有全新认识。乾隆四十三年（1778）第三次谒陵时，皇帝在一则上谕中，对此有所论断：

① 丁海斌、时义：《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1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四月乙酉。

③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86—87页。

④ 中国第一档案馆编：《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汉文译文），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734—735页。

⑤ 《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壬子。《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423《礼部》，中华书局，1991年，第5册，第747页。

⑥ 四次祭奠盛京太庙，分见《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庚戌；卷22，顺治二年十二月戊申；卷27，顺治三年七月乙巳；卷33，顺治四年七月庚子。

⑦ 《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乙丑。

⑧ 顺治十七年（1660）定例，酌派宗室、觉罗二员移居于彼，以供祭献；康熙八年（1669）改于每岁四节大祭时遴选宗室及觉罗遣祭；康熙十八年又改为以盛京将军等官员致祭。参见《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宗人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12—13页。

⑨ 《康熙帝墨笔密谕》（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页。

⑩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幸陵日期折》（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第1330页。

夫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恳若是，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轍而兴思，拜旧里松楸而感怆，自必凜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矣。^①

可以看到，高宗对盛京谒陵意义的表述，已经不再停留于君主和大臣之间秘密通信中，而是对臣民公开宣教，成为朝廷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这说明，谒陵活动已经从皇帝个人追思祖宗的“孝思”抬升到对清朝“天眷”、“先泽”的重申，关乎朝廷根本“永保勿坠”的高度。

在这一转变中，乾隆八年高宗首次举行谒陵盛典是其起点。这次谒陵起于该年七月初八日，皇帝奉皇太后先赴热河，再往盛京，展谒祖陵，于九月二十四日进入盛京城。次日，皇帝亲自率王大臣诣太后宫行庆贺礼，并颁诏天下，赐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等及扈从之王、大臣等宴。^②十月初一日，皇帝启銮回京，临行前发布了《盛京赋》。^③因此，虽然从程序上讲，行礼、颁诏、赐宴均表示谒陵礼成，但事实上只有《盛京赋》的发表才真正宣告这一次东巡谒陵圆满落幕。这正是《盛京赋》的创作背景。

二、《盛京赋》的政治涵义

《盛京赋》同时有满汉两种文体，满文韵脚完备，汉文典故繁复，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中兼具匠心，可称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一种体现。^④汉文本《盛京赋》分为序文、赋文、颂文三部分。序文中略述了《盛京赋》的写作背景，亦即该次东巡谒陵活动之大要。其开头强调“以祖宗之心为心”的重要性，暗示《盛京赋》并非单纯追求文词富丽的盛世雅颂，而带有政治意涵：

尝闻以父母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为心者，天下无不爱之民物。斯言也，人尽宜勉，而所系于为人君者尤重。然三语之中，又惟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焉。^⑤

赋文是《盛京赋》的主体部分。在该部分中，高宗逞其文采，叠砌嘉辞，广引典故，先叙盛京山川壮阔、草木茂盛、鸟兽丰美，以示满人祖先受命于此；继而列述太祖太宗肇基“旧沈”，营建城垣，厘定八旗，辟清礼俗，勘正国语，征伐诸部之事，指出正是由于盛京“郁葱佳气，盘礴无垠；民风噩噩，伾佚自然”，而“国以殷富，兵以盛强”，才有世祖“因人心之归清，顺天意之厌明，扫驱除之闰位，统子弟之精兵，无亡矢遗镞之费，而膺图正位乎燕京”。回顾盛京的自然情况、人文气息及历史故事之后，高宗如此表述“盛京”这一政治符号的意义：

尝考千古之兴替，稽百代之历数，拒符瑞之难谶，信仁义之堪守，斥逐鹿之盍说，审神器之有授，乃如帝命不时眷清孔厚也。不有开之，何以培之？不有作之，何以得之？夫其披荆棘，冒氛霾，历艰辛，躬利害，无嬗代之迹而受车书之来者，盖《书》所谓“于汤有光”，《诗》所谓“民之攸归”矣。皇矣陪都，实惟帝乡！^⑥

换句话说，盛京“帝乡”的风土、民俗、历史，决定了清朝能像“汤、武革命”一般，“无嬗代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9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一日，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288—289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201，乾隆八年九月甲辰。

③ 《清高宗实录》卷202，乾隆八年十月庚戌。

④ 金焘方：《满文诗〈盛京赋·颂词〉的艺术特色》，《满族研究》1985年第1期。

⑤ 清高宗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武英殿刻本，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馆藏号：FC. 99.25。该馆已披露其书影：<http://cudl.lib.cam.ac.uk/view/MS-FC-00099-00025>。《清朝通志》亦录有此赋文，见《清朝通志》卷34《都邑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志6932。

⑥ 清高宗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武英殿刻本。

之迹而受车书之来”，享有国祚，可谓皇矣。这无疑是对盛京之政治文化意义的一次华丽展示。

颂文亦表达了类似的情感：盛京之地，“大山广川，作观万方；虎踞龙蟠，紫县浩穰；爰浚周池，爰筑长墉；法天则地，阳耀阴藏”；清人祖先“休养百年，既丰而泰；溯其始谋，继序敢懈”；在谒陵过程中，高宗亲眼目睹了“左城右平，坤闾乾辟，土壁葛灯，遐哉俭德”，乃教其后人“敬之敬之，翼翼惓惓，于亿万岁，皇图永绵”。^①

总的来看，《盛京赋》描述中的盛京同时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优厚的自然条件，象征着大清得自天眷；淳朴的社会礼俗，展现着满人道德风尚；肇基建都的历史，启示后人不可“忘本”。这三点特征呼应着“敬天法祖”的清代政治文化，决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后人但遵“以祖宗之心为心”便可延续其德，国祚绵长。这便是《盛京赋》文本中所展示的政治意涵。

《盛京赋》的政治属性，并不仅在于其文本，也在于其呈现形式。乾隆十三年（1748），高宗颁谕，以满文篆体“虽旧有之而未详备”，“宝玺印章尚用本字”，乃“指授臣工，肇为各体篆文，儒臣广搜载籍，援据古法，成三十二类”^②，继而以《盛京赋》缮成清汉篆文。是为满汉合璧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纂修之始。主持此项修撰之总裁官为傅恒和汪由敦。参与者可考有二，一为董元镜，系当时有名的旗人篆刻家，因汪由敦之延聘而入馆；^③另一人为董炳，本来即以精篆刻与绘画而在内务府供职，也派入该馆。^④可知该工程颇得朝廷重视，汇聚了国家最优秀的一批篆刻人才。

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的纂成，为“各体未备，传习尚稀”^⑤的满文篆体在对照汉文篆体的基础上确定了规范字形。高宗对此举深为自负，认为“既广国书，并传古篆，足以昭示来许”。^⑥傅恒等纂修官亦体察到了高宗通过满汉合璧、“并成六书”使满汉文化相互呼应的用意，在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最后一册跋语中径谓：“国书之新模既广，古篆之旧制益完”。《清朝通志》之“六书”一节的编者，对于这一纂修工作的成就亦表赞同：

虫鱼、鸟兽、草木、山川，陶镕万象，归于一治，又直追古皇仰观俯察之心，以神而明之，则国书为谐声之祖，何尝非象形之祖？^⑦

可以说，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的纂修，大大丰富了《盛京赋》的展现形式，其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诗赋文学层面，更有提升满文的文化底蕴、拓宽满洲族群文化外延的深意，蕴含着满汉调和的意旨。^⑧

除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外，高宗还邀集朝中文人选制《盛京赋》文卷碑帖。就清廷典籍所记载，内府所藏有真草隶篆四体书帖《盛京赋》，“真书为励宗万，草书为梁诗正，隶书为张若霭，篆书为汪由敦。册高二寸许，笔细如发”^⑨。《石渠宝笈》中又有陈邦彦小楷书《盛京

① 清高宗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武英殿刻本。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第238页。

③ 汪启淑：《续印人传》卷4《董石芝传》：“董元镜，字观我，号石芝，汉军正黄旗人。祖天机，直隶巡抚；父泗儒，户部江南司员外。石芝生而沉静警敏，长耽六书古文，终日临池孜孜沉研八体，专以汉印为宗，兼师文氏纯正一派。选入官学，颇有声誉。……章法刀法皆浑厚朴茂，技遂日进。乾隆戊辰春，特旨开《盛京赋》篆字馆，家文端公由敦为总裁，素器识石芝，因举荐上馆。”见顾湘辑：《篆学琐著三十种》，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92册，第85页。

④ 乾隆《三河县志》卷13。

⑤ 《清朝通志》卷12《六书略》，志6811。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238页，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⑦ 《清朝通志》卷11《六书略》，志6807。

⑧ 张万兴：《汉满三十二体篆书〈御制盛京赋〉的影响及其对中国书法史重构的启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关于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在书法角度的意义，可参见游国庆：《古汉字与杂体篆——以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为例》，（台北）《书画艺术学刊》，2006年第1期。

⑨ 《清朝通志》卷116《金石略》，志7400。

赋》卷轴，亦为宫廷精藏。^① 凡此种种，均为《盛京赋》超越文本内容的存在。高宗利用这一盛京诗文的反复书写制作，将承载着历史文化象征的诗卷抬升到宝物的地位，使人们从物质文化的精致，感到“盛京”这一文化符号的厚重，进而产生对盛京以及背后清朝政治文化的崇敬。

总之，《盛京赋》不仅是一部清代宫廷诗赋，更是皇帝对清朝政治文化的一种展示。它的创作起于清高宗首次东巡谒陵，但又不仅是这次活动的纪述，而是通过华丽的辞藻来渲染这一活动中的见闻与随感来阐释皇帝心中的“国家圣地”，进而表达皇帝理想中的政治图景。而在创作之后，皇帝又一再精制秘卷，试图通过物质文化显示《盛京赋》的内涵。皇帝晚年自称谒陵诗作“实足以垂法守，非仅托为吟咏”^②，充分说明了其政治文化建构的本质。

三、《盛京赋》的传播

文化活动的成果，必须要经过传播推广的过程才能彰显其意义。《盛京赋》诗集的流通，特别是其逐级传阅与扩散的过程，颇能反映出盛清朝廷如何以政治手段将其文化观念推向臣民。

《盛京赋》的书册在外流传者，主要为乾隆八年（1743）武英殿朱墨套印一卷本。^③《国朝宫史》录大内收藏图书，其中《盛京赋》条目记载称其最早刊于乾隆八年，当即此本。^④高宗谒陵回京，事在该年十月二十五日，^⑤则其刊刻大约在此之后不久。

在京士人，是《盛京赋》重点颁赐对象。清代北京，士子云集，或入学监中，或与试科举，或就教官学，或供职翰林，大率同清廷教育体制产生联系。而皇帝赐书的主要渠道，亦是针对学校及词馆建制。乾隆八年遍赐国子监肄业学生，人各一部，又赐给满文本《盛京赋》于国子监收藏。^⑥这一赐书活动，打破了以往颁赐国子监图书例由所司收贮、“听生取阅”的惯例，直接颁给生员本人，史臣谓为“出自特恩”^⑦。乾隆九年四月，皇帝又赏赐翰詹诸臣《盛京赋》各一册。^⑧十一月十七日，内阁典籍厅有一件档案称镶白旗觉罗学领回四部《盛京赋》诗册，并提及这四册书的来源是武英殿。^⑨这一图书收发案例中，诗册从武英殿刻书处经由内阁再到学校，展示了诗册在京流传的孔径。此外，下层官员也有零星得赏者。例如韩锡胙，乾隆十二年顺天乡试举人，供职国子监期间与朝鲜使臣争辩，胜之，经国子监祭酒鄂容安奏明，赏给《盛京赋》诗册一部，“以小臣得邀御赐，诚异数也”^⑩。

除在京士人外，高宗还将书册广泛赐予各省督抚、驻防将军。这一过程从这些“方镇重臣”的回奏折片中略可得窥一二。^⑪折片中提到传递图书的方式是由“赍折把总”、“赍折家人”带往各省，例如两江总督尹继善在奏折开头称：“十一月二十四日，臣赍折人回，荷蒙恩赐御制

① 《石渠宝笈》乾清宫贮卷6，见《故宫珍本丛刊》第438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②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③ 关于《盛京赋》的版本，可参见卢秀丽：《乾隆〈御制盛京赋〉版本源流》，《满族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鄂尔泰等编：《国朝宫史》卷2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203，乾隆八年十月甲戌。

⑥ 文庆等编：《钦定国子监志》卷65《经籍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46页。

⑦ 文庆等编：《钦定国子监志》卷81《志余》，第1491页。

⑧ 朱珪编：《皇朝词林典故》卷26《恩遇》，余来明编：《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76页。

⑨ 《内阁大库档案》，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登录号：106739-001。

⑩ 光绪《处州府志》卷末，《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93册，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101页。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内收录了各省高级官员奏谢恩赏诗册的折片，这方面情况参见本文附表1。

《盛京赋》。”^①可知这次书籍分发，是利用了各省在京传递奏折的机制，命提塘官及咨折家人与批回奏折一起带往。从塞北到岭南，远近悬殊，但各省收到书册的时间几乎都集中在一个月以内，可知皇帝用心颇深，特意在短期内如紧急文书般集中发给各省。

在直接御颁书册以外，皇帝还曾利用江南发达的出版业，将《盛京赋》重行印制、以广传阅。苏州巡抚陈大受在收到赏赐的《盛京赋》书册后，奏请广加刊刻：

惟三吴为人文之藪，类多服古之士，恭阅御制，瞻仰末由，輿情肫切。臣敬谨刊刻，广布四方，俾得家户诵，人人服习。虽管窥穹昊，蠡测沧溟，无以悉喻高深，而儒生末学，获知王业之兴隆、圣学之渊博，于以长其忠爱之心、矢其钦承之志，则我皇上教思所被，益永永无既矣。^②

稍后，浙江巡抚常安也在谢恩折中奏请将《盛京赋》在当地重行刊刻：

臣愚以为尤宜家絃户诵，俾四海臣民咸知大统之肇基、圣孝之善述。即如浙省仰赖皇上承明之治，渐喜人文化成，观感尤切。可否仰恳圣恩，容臣照式刊刻，酌量宣示，用以昭巍焕之文章？其于圣化当亦不无裨补。^③

陈大受与常安的建策相似，均是要以《盛京赋》作为教材，令士子在阅读、品鉴中领会皇帝对开国历史的深厚感悟，巩固士子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感；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广加刊刻，俾得流传。次年三月，陈大受奏称已刊刻告竣，装潢四十函进呈皇帝，同时“一面颁发各学暨各书院士子诵习，仍听四方绩学之士赴局印购”，从此“家有球图之宝，肆列法象之文，至教覃敷，莫不欢欣鼓舞”^④。此一时期，直隶、顺天地区商业刻书事业并不发达：就在《盛京赋》创作稍晚，乾隆八年十二月时顺天学政赵大鲸奏称，由于“北地纸贵，工本太昂”，“前任江西学政时，刷印四经性理，只需一两六钱，今直隶则需七两有奇”^⑤。连圣祖御纂四经性理等科举经典教学用书的出版都有困难，大规模刊行《盛京赋》难度可想而知。而江浙发达的商业刻书出版业，则很好地补上了这个缺憾。^⑥

陈大受奏折中提到已将刻成的诗册颁发各学校，这一点可以从方志中得到印证。^⑦目前所见《盛京赋》诗册收藏仅限于江浙两省。溧水、武康、诸暨三地的方志均标注了颁赐时间为乾隆九年（1744）；各学所藏诗册多标明“一册”或“一部”，与各省督抚谢恩折中所述书册体例相同。这些记载都是江浙两省以皇帝的名义将重刻诗册颁发各州县的结果。迟至嘉庆、道光时，方志编纂者仍能见到这些诗册，证明它们经历了数十年以后仍然存世，直到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江南。^⑧

有趣的是，虽然《盛京赋》系讴歌盛京的诗篇，但皇帝散发该书、展开政治宣教的版图中并不包括盛京。乾隆八年《盛京赋》诗册恩赏各省时，并未及于盛京将军；奉天方志中亦未载州县学校有收藏《盛京赋》。当年冬，皇帝选定了一批图书，命人前往盛京办事时乘便赍送盛京

① 《朱批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37-061。

② 《朱批奏折》，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37-009。“于以长其忠爱之心”，其首“于”疑系衍字。

③ 《朱批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4-0030-031。

④ 《朱批奏折》，乾隆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003-026。翁连溪在整理内府刻书档案时曾注意到这一折片，但其整理本删削很大，基本丧失了该折原意，今不取，见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第110—111页。

⑤ 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卷77《赵大鲸传》，周骏富编：《清代传记丛刊》第18册，明文书局，1985年，第295—296页。

⑥ 陈大受与常安均未详述重刊过程，但从常安折中“照式”一语判断，应是据武英殿本依样重刻。

⑦ 方志文献中所见各县学校收藏《盛京赋》的情况，可参见本文附表2。

⑧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中江浙地区的动荡情况及其文化反映，可参阅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75-200.

内务府“敬谨收贮”，该名官员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出发。^①盛京内务府档案的一件残档记载了这批图书的目录，其中第七箱包括《盛京赋》三册。^②这是《盛京赋》分发盛京最早的记录。两年后，乾隆十一年（1746）武英殿御书处再次刻出一批《盛京赋》诗册，仍采用相同方式交予盛京内务府收贮。^③两次赏送书籍，显然都是单纯作为礼仪的收藏，只在“晒晾之时”^④才能得见天日，并不能流通供人阅读，盖其意并非教化盛京地方之士子。盛京地区在《盛京赋》流通版图中的隐形，反过来也可以证明《盛京赋》并不是一件“地方文本”，而应是中央政治文化的表达手段。

与乾隆八年至九年间的颁赏活动相比，高宗日后精制之三十二体篆文《盛京赋》的颁赏范围就要窄得多。今见篆体《盛京赋》武英殿刻本有两种衍生版本：一种仅有汉文，三十二册；另一种为满汉合璧，六十四册。^⑤据附表1可知，乾隆二十四年亦曾颁赐各省督抚，但仅涉及十人，其中杨锡绂、陈宏谋两次均得赐。浙闽总督杨廷璋在回奏中，将获赐书册描述为“钦赐御制《盛京赋》清汉篆书三十二体计六十四册”^⑥，可知高宗所赐为后者。各地督抚收到书后循例谢恩，但并无进一步刊刻的举动。^⑦方志中所见江南各州县学校藏本均标为“一册”“一函”，可知这些单册本均非三十二体《盛京赋》。总之，皇帝对于晚出之三十二体《盛京赋》书册，并未如乾隆八年初版一般热心传播。大约三十二体《盛京赋》意在厘正字体，以为国文典范，乃藏之名山，并非为士子诵习之用。

总之，《盛京赋》诗册的流通，固然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其中的政治意义则更值得重视。应该指出，清圣祖虽三谒祖陵，但从未将谒陵纪念诗文发下臣僚。康熙二十七年（1688）冬，御制福陵、昭陵神功圣德碑文，仅是勒石于陵前，并未给臣下传阅，《起居注》亦不载其文。^⑧与乃祖相比，高宗对谒陵诗赋的展示无疑要积极得多。个中缘由，固然与高宗喜弄文墨的个性有关，但放眼整个运作过程，则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建构“有为之”的轨迹。皇帝御赐各省督抚《盛京赋》诗册，以及此后江浙两省基于赏赐诗册的重刻和颁发，还有州县学校对这些诗册长达一个世纪的保存，构成了一个漫长的、从皇帝到士子的书籍流传的链条。同时，皇帝也通过京师文化教育体制，针对在京士人群体颁赐《盛京赋》诗册。两条途径，一条结合了行政文书网络与商业出版业，另一条利用了“大一统”王朝对学校教育体系的掌控，最终达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读物的传播。这一链条中，带有政治意味的、“自上而下”的宣教是书籍流传的动力，国家行政信息体系与文教组织是其伸展渠道，而江浙的图书刊刻行业则是权力与文化的结合点。

① 《和硕和亲王为朱笔圈出书一百三十七种解送盛京收贮事谕》（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辽宁省档案馆编：《黑图档·乾隆朝》第2册，线装书局，2016年，第311—312页。

② 《书籍装箱目录（残）》（无时间项），辽宁省档案馆编：《黑图档·乾隆朝》第2册，第308页。

③ 《都虞司为知会果园催总宋鼎等带往八旗氏族通谱等书籍请查收事咨掌管理盛京内务防佐领等》（乾隆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附《和硕和亲王谕》，杨丰陌编：《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④ 《和硕和亲王为朱笔圈出书一百三十七种解送盛京收贮事谕》（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辽宁省档案馆编：《黑图档·乾隆朝》第2册，第312页。

⑤ 中国民族图书馆有该六十四册本，著为光绪朝武英殿刻本，疑系乾隆本之重印。

⑥ 《朱批奏折》，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95-046。

⑦ 杨锡绂身后，其子杨有涵纂成遗集，仅录其乾隆八年谢恩折，不及二十四年之折片，亦见时人态度有差。其所录八年奏疏见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6《谢御制赐盛京赋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138，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甲辰。

四、被阅读的《盛京赋》

在官方的力推之下，作为带有政治属性的文艺书写，《盛京赋》进入了18世纪中后期清朝士人的阅读世界之中。对《盛京赋》的阅读体验，以模仿、评述等衍生写作的方式展现出来，构成了清人对《盛京赋》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接受史。

《盛京赋》发表后，最先出现的阅读与回应来自在京文人官僚。《皇清文颖》中收录了不少文臣在谒陵礼成后撰写的纪颂诗赋，例如翰林官员宋楠有“彩毫珠玉三千字，亲洒云笺赋盛京”^①之句；另一翰林官员于振，虽“未获躬随法驾”，仍撰制谒陵恭纪诗，其中有句：“万几清暇富文章，顷刻龙鸾天际翔，赋就盛京思剑舄，舞成世德念羹墙。”^②以上显然均系读《盛京赋》之后所作。这些都是从歌颂谒陵盛典的角度回应《盛京赋》。

在京朝廷文臣对《盛京赋》的阅读与回应中，注文、跋语之缀增，尤为醒目。乾隆八年武英殿朱墨套印本《盛京赋》中，除了皇帝诗赋原文外，句间有注文，篇后有跋语。注文和跋语由朝中两大重臣鄂尔泰、张廷玉领衔，多位高级官员列名，而实际作者则为兵部侍郎汪由敦。鄂、张两人均未扈从东往，因而注解与作跋更多是以文学上的接受来显示政治上的效忠。注文中博引经史，用儒学经典及历史故事解说赋文句意。而跋语则高度评价了高宗此赋的文采，以为“自书契以来，著作之府，鸿章巨篇，未有盛于斯者也”；但更重要的是，跋语中强调了盛京这一符号在清朝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所谓“我皇清凝受宝命，奠亿万载丕基，肇迹神皋，抚临中夏，发祥流庆，实始盛京”，而皇帝谒陵，意义不仅在于“谒桥山而展孝”，更重要的是通过“揽形势之浑雄，仰宫阙之素朴，缅英贤之勋绩，怀德化之忠厚”，体悟“夫天作帝省之勤，所以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者，厥有所自”，亦即以展谒祖宗陵寝、望察满洲旧俗、闻见开国史事的方式，领会及阐发清代政治文化；故而在跋语作者看来，《盛京赋》亦非寻常诗赋，而有着皇帝宣示教化的重要意义，所谓“摭宝墨、挾奎章，思若涌泉，笔不停缀，勒为斯赋，垂示无极”^③。这无疑是对《盛京赋》中政治意蕴的呼应。

汪由敦还撰制了《盛京赋赞》，以另一种诗赋文体对《盛京赋》作唱和：

丹陵苍苍，京邑煌煌。我皇至止，龙旗洋洋。肆觐桥山，祀事孔明。载临艮宫，有秩其容。以朝以晏，以诘戎兵。仪举礼备，风翔恩滂。爰洒宸翰，经纬宫商。摘藻云汉，濡毫溟沧。含跨东马，陶铸班扬。笔不停缀，蔚为天章。昭示万古，何天之龙。传观骇汗，盥诵激昂。敬勒籀篆，冀托无疆。^④

毫无疑问，注文、跋语及《盛京赋赞》是朝廷重臣在仔细阅读《盛京赋》、理解赋文句意、领会隐藏在赋文之下的政治涵义的基础上，对《盛京赋》的二次阐发，亦是意识形态建构工程在朝廷大臣处所得到的正面回应。颁发于外的《盛京赋》诗册，是皇帝赋文与大臣注跋的融合，展现了一种君臣同心、翼戴国统的文化情境。

随着《盛京赋》书册的传播与扩散，不同层级的读者亦给出了多样的回应。皇帝将《盛京赋》诗册颁赐各省大员时，各省督抚的反应深浅不一。例如广州将军策楞，“跪读鸿篇”之后，称《盛京赋》的文字“真不羨《三都》《两京》之富丽”，并颂及此次谒陵“论列佐命，褒及重

① 宋楠：《圣驾东巡盛京恭谒祖陵大礼庆成诗》，张廷玉等纂：《皇清文颖》卷100，《故宫珍本丛刊》第650册，第362页。

② 于振：《圣驾东巡盛京恭谒祖陵大礼庆成诗》，张廷玉等纂：《皇清文颖》卷87，《故宫珍本丛刊》第650册，第170、171页。

③ 高宗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武英殿刻本；亦见汪由敦：《松泉文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38—839页。

④ 汪由敦：《松泉文集》卷13《盛京赋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8册，第823页。

泉，殁存均沐恩荣，实为亘古未有之旷典”。^①而浙江总督常安对《盛京赋》的领会，则显然较“未尝学问”的策楞要深得多：

虽臣之謏陋，万不足以窥测高深，而天心之所以眷顾，与列圣之所以凝承，以及山川之广厚、规制之周详、俊杰之挺生、庶物之蕃盛，无不昭若日星、炳如云汉，并仰见我皇上敬天法祖、基命宥密之圣心，以此益颂天朝景运原为超轶古今，而圣主宸章尤足并垂谟典。……盛京发祥之地为祖宗缔造之区，今又钦奉御制，敷扬光昭，文谟武烈，岂若《三都》《两京》仅属词臣之作！^②

常安与策楞均将《盛京赋》同中国文学史上赋文的典范《三都赋》《两京赋》相比较，这是清人对《盛京赋》的常见感受。所不同的是，策楞赞颂高宗之文笔富丽，仅属一般谀词；而常安则提出，《三都赋》《两京赋》仅是文辞华丽的“词臣之作”，而《盛京赋》则体现了“天心眷顾”、“列圣凝承”及高宗“敬天法祖”的“圣心”，故而这一承载了“发祥”意蕴的赋文足以“垂谟典”，有着政治教化的作用，较之绮丽颂词更有分量。可以看到，常安的看法，无疑更接近高宗的本意。

除了省级官员，借助于地方刊印，江浙地区的普通士人们均可在学校读到《盛京赋》的重刻本。乾隆十六年南巡时，即有“工书”之苏州籍贡生蒋仙根缮写《盛京赋》进呈，“蒙文绮之赐”。^③清中叶的地理学家徐松在述及当时以舆地观念为题材创作赋文的风尚时，将《盛京赋》作为引领流风的起点：

国家抚有六合，尽海隅出日咸入版籍。康熙、乾隆中屡测星度，刊定舆图，于是绩学之士闭户著书，能知宇宙之大。又恭读高宗纯皇帝圣制《盛京赋》，流天苞以阐地符。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④

《中山赋》等一批名作均系仿照《盛京赋》而生，可见《盛京赋》的传播与阅读对当时士大夫的巨大影响。朱珪谓《盛京赋》“万口传诵”，^⑤的非虚言。

总结以上对《盛京赋》的阅读与回应，不难看出《盛京赋》的接受史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事实上，《盛京赋》的传播令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正是官方主导下的结果；高宗亦有意利用这一方式，力图令臣下在阅读、唱和《盛京赋》时，一面要品鉴文艺写作方式，一面要体察政治文化意蕴，以期同时强化其文学与政治意义。乾隆十九年高宗第二次谒陵后，兵部侍郎彭启丰撰有《圣驾再临盛京赋》，在序文中提到皇帝特地对诸臣“宣示《盛京赋》”，暗示文人以此为撰写谒陵恭纪诗赋的范本。^⑥乾隆朝“五词臣”之一的钱陈群也提到，高宗第二次谒陵期间他曾“伏读八年秋皇上御制《盛京赋》一篇”，并称“凡以发明祖德，推本所自，山川形胜、风土人物，自文字肇起以来称极则焉”^⑦，与彭启丰之记述相印证。可知皇帝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将传阅《盛京赋》作为对臣下“宣布德教”的重要媒介。而从钱陈群的读后感来看，这一宣示活动无疑起到了效果。后来钱陈群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御制《盛京赋》，追溯列祖创业垂统，原发迹之隆，述治谋之远，山川之深厚，风俗之敦庞，数千余言，考据精博，气体高皇。其于风也，为《七月》；其于雅也，为《生民》。

① 《朱批奏折》，乾隆九年正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38-015。

② 《朱批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4-0030-031。

③ 道光《苏州府志》卷102《人物·文苑》。

④ 杨鍾羲：《雪桥诗话》卷9，《雪桥诗话全编》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517页。

⑤ 朱珪：《知足斋文集·进呈文稿》卷2《御制盛京颂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393页。

⑥ 彭启丰：《芝庭文稿》卷1《圣驾再临盛京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3册，第441页。

⑦ 钱陈群：《香树斋诗续集》卷5《圣驾再巡盛京恭谒祖陵大礼庆成雅》之序文，《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8册，第412页。

真书契以来第一文字!^①

钱陈群此语固系谀词，但其关照更值得注意。他的《盛京赋》阅读体验不仅有对“气”的关注，更有对“发迹”“山川”“风俗”在“创业”中意义的领悟。这正是高宗想要让人接受的政治文化观念。钱陈群对赋文作出了“第一文字”的高度评价，但他在具体阐发这一评价时，涉及文采的“气体”仅有一句解释，而对思想内涵的解读则占了五句之多，这才是钱陈群立论的重点。《盛京赋》的阅读，提示文臣在日后创作与评价诗赋时，不仅要重视文采，更要重视思想性，亦即诗赋要与政治文化的主题相称。在这一语境中，《盛京赋》是权力规训的范本，而阅读则是规训的手段。

另一方面，《盛京赋》的政治意味反过来也抬升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事实上，清人以盛京的名义撰写诗赋，并非始自高宗：康熙《盛京通志》录有承德县知县章经所撰之《盛京赋》，大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圣祖第二次东巡时；^②稍晚，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三次东巡谒陵时，又有铁岭县知县许志进撰《盛京赋》进呈，有诏嘉奖。^③可见，以《盛京赋》之名，讴歌乡土、称颂巡谒，盛京地方士人官僚早已为之。然而在清人阅读史中反复现身的，并非这两作，而是比它们晚出数十年的高宗御制《盛京赋》。高宗御制赋文“万口传诵”，而章经之赋文仅存于方志，几乎无人提及，至于许之赋文则已亡佚。这种阅读体量上的差异，当然是由于御制《盛京赋》在权力推动下得到传阅与宣示，并被赋予了政治文化意蕴的缘故。

五、结语

在《盛京赋》中“盛京”成为一个符号，象征着清代政治文化的深层含义：自然环境优渥、社会风俗淳朴，代表清朝国统得自天眷、人民沐浴德化；而肇基建都的历史，则启示后人应“以祖宗之心为心”，发扬谟烈，不可“忘本而泯良”。可以说，《盛京赋》重新确定了盛京在清朝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亦是清代“敬天法祖”政治理念的集中反映。而在《盛京赋》的阅读史中，可以看到，清王朝政治权力的运使方式十分多样。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庞大的官僚体系，施加对精神世界的影响，从而将政治渗入文化的领域中。同时，在政治体制之外，皇帝仍有其他渠道可以贯彻其意志，例如向文臣宣示诗册、对进呈诗册的文人给予奖励等。这一微型案例的解剖，提示了18世纪清朝统治的复杂性——它不仅是一个“军事财政国家”，还具有将政治文化图景推向臣民的强大力量。

高宗去世后，其继任者清仁宗仍用御制谒陵诗文作为申述政治文化的手段，而《盛京赋》的推广经验则成为仁宗仿效的对象。嘉庆十年（1805）秋，仁宗初举谒陵，效法《盛京赋》作《盛京颂》遍示群臣，并于是年冬刻印六十册，命大学士庆桂等拟定颁赐对象。^④从各省督抚奏谢赐书的折片中可以看到，仁宗在颁赐《盛京颂》时，同样使用了奏折文书的传递系统。而且盛京仍被排除在第一轮颁赐名单之外，直到诗文创作数月后才命来盛京办事之笔帖式一并带往，盛京将军“敬谨查收，恭贮内库”，^⑤不予示人。这与高宗时期《盛京赋》的传播雷同。当时人亦意识到《盛京颂》与《盛京赋》的联系，朱珪为《盛京颂》作跋语，曾谓：“先是纯皇作盛

① 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18《敬书国俗辑纪恭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9册，第199页。

② 康熙《盛京通志》卷23《艺文志》。

③ 屠粹忠：《铁岭县学记》，见民国《铁岭县志·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第11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④ 《内阁大库档案》，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登录号：173791-001。

⑤ 《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495-012。

京赋，皇上今作颂，”“圣作圣述，先后合揆，则从古所未有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仁宗的模仿，亦是建立在细读《盛京赋》、理解其中政治意蕴的基础上。嘉庆二十三年再次东巡谒陵时，仁宗御制《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谓：

我皇考高宗纯皇帝丙辰御极，癸亥展祀。敬诵圣制《盛京赋》，巍焕天文，聿昭美备。仰窥“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一言赅众理。传奕祀子子子孙孙钦承勿替。大清景运隆长，实系于此也。^②

这是对《盛京赋》在清代政治文化体系中的定论，可称《盛京赋》在清人阅读史的定格。

附表1 乾隆朝《盛京赋》在各省的分发情况

序号	档号	收到书册时间	具奏谢恩时间	官职	受赐人	传递书册者
1	04-01-12-0037-046	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八年十一月初九日	直隶总督	高斌	(不详)
2	04-01-12-0037-044	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山西巡抚	刘于义	賚折千总赵世英
3	04-01-12-0037-052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陕西巡抚	塞楞额	賚折人
4	04-01-12-0037-011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河南巡抚	硕色	賚折家人
5	04-01-12-0037-031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东河总督	完颜伟	賚折人
6	04-01-12-0037-029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江苏布政使	安宁	賚折家人
7	04-01-12-0037-026	(不详)	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东巡抚	喀尔吉善	賚折千总马中和
8	04-01-12-0037-030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湖北巡抚	晏斯盛	标员王登武
9	04-01-12-0037-010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苏州巡抚	陈大受	賚折家人
10	04-01-24-0030-031	(不详)	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浙江巡抚	常安	(不详)
11	04-01-12-0037-081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南河总督	白钟山	賚折把总
12	04-01-12-0037-080	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漕运总督	顾琮	賚折把总
13	04-01-12-0037-061	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署理两江总督	尹继善	賚折人
14	04-01-12-0037-066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江西巡抚	陈宏谋	賚折家人
15	04-01-12-0037-069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闽浙总督	那苏图	賚折外委千总
16	04-01-12-0037-068	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广西巡抚	杨锡绂	家人
17	04-01-12-0037-092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安庆巡抚	范璨	賚折家人
18	04-01-12-0037-102	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贵州总督	张广泗	賚折家人
19	04-01-12-0037-064	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巡抚	纪山	賚折外委把总王廷臣

① 朱珪：《知足斋文集·进呈文稿》卷2《御制盛京颂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393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3册，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

续表

序号	档号	收到书册时间	具奏谢恩时间	官职	受赐人	传递书册者
20	04-01-12-0038-031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九年正月初六日	湖南巡抚	蒋溥	家人
21	04-01-12-0038-015	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九年正月十五日	广州将军	策楞	赍折把总
22	04-01-12-0038-038	(不详)	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甘肃巡抚	黄廷桂	赍折家人李福
23	04-01-12-0039-073	(不详)	九年三月初五日	云南总督	张允随	赍折
24	04-01-12-0044-003	(十年正月)	十年三月十六日	安徽布政使	魏定国	(陛见当面赏赐)
25	04-01-12-0095-032	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漕运总督	杨锡绂	(不详)
26	04-01-16-0039-053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东河总督	张师载	提塘官杨定谋
27	04-01-12-0095-063	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	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甘肃总督	杨应琚	提塘官王化行之下属
28	04-01-12-0095-060	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	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福建巡抚	吴士功	提塘官
29	04-01-12-0095-046	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	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浙闽总督	杨廷璋	提塘官
30	04-01-12-0096-008	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江苏巡抚	陈宏谋	赍折人
31	04-01-12-0096-015	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	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甘肃巡抚	吴达善	提塘官
32	04-01-12-0096-019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陕西巡抚	钟音	赍折把总
33	04-01-12-0097-002	(不详)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署理江西巡抚	阿思哈	提塘官
34	04-01-12-0097-038	(不详)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川总督	开泰	提塘官赵大伸
35	04-01-13-0103-042	“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详)	詹事	王图炳	专差家人

附表 2 地方学校收藏《盛京赋》的情况

省份	地点	藏书位置	出处	备注
江苏	邳州	州学	乾隆《（邳州志）》（乾隆十五年刻本）卷 3	
江苏	通州	州学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光绪二年刻本）卷 5	
江苏	江阴	县学	道光《江阴县志》（道光二十年刊本）卷 5；光绪《江阴县志 30 卷》（光绪四年刻本）卷 5	毁于太平军
江苏	丹徒	县学	光绪《丹徒县志》（光绪五年刊本）卷 19	毁于太平军
江苏	金匱	县学	嘉庆《无锡金匱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卷 6；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光绪七年刊本）卷 6	毁于太平军
江苏	荆溪	县学	嘉庆《重刊荆溪县志》（嘉庆二年刻本）卷 2	
江苏	句容	县学	乾隆《句容县志》（光绪重刊本）卷 6	
江苏	溧水	县学	乾隆《溧水县志》（乾隆四十二年）卷 6；光绪《溧水县志》（光绪九年刊本）卷 7	乾隆九年奉颁，毁于太平军
江苏	如皋	县学	嘉庆《如皋县志》（嘉庆十三年）卷 9	
江苏	吴江	县学	乾隆《吴江县志》（民国刊本）卷 8	
江苏	宜兴	县学	嘉庆《重修宜兴县志》（嘉庆二年刻本）卷 2	
江苏	震泽	县学	乾隆《震泽县志》（光绪重刊本）卷 7	
浙江	绍兴	府学	乾隆《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卷 19	

续表

省份	地点	藏书位置	出处	备注
浙江	昌化	县学	道光《昌化县志》（道光三年钞本）卷 17	
浙江	常山	县学	光绪《常山县志》（光绪十二年刊本）卷 29	
浙江	长兴	县学	嘉庆《长兴县志》（嘉庆十年刻本）卷 4；同治《长兴县志》（同治修光绪增补）卷 4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慈溪	县学	光绪《慈溪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卷 4	毁于太平军
浙江	东阳	县学	道光《东阳县志》（民国三年东阳商务石印公司石印本）卷 10	
浙江	奉化	县学	光绪《奉化县志》（光绪三十四年刊本）卷 8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海宁	县学	乾隆《海宁州志》（道光重刊本）卷 1	
浙江	淳安	县学	乾隆《淳安县志》（乾隆二十一年）卷 2	
浙江	嘉善	县学	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光绪十八年刊本）卷 36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嘉兴	县学	嘉庆《嘉兴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卷 5；光绪《嘉兴县志》（光绪三十四年刻本）卷 5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建德	县学	道光《建德县志》（道光八年刊本）卷 7	
浙江	景宁	县学	同治《景宁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卷 5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兰溪	县学	光绪《兰溪县志》（光绪十四年刊本）卷 3	毁于太平军
浙江	龙泉	县学	乾隆《龙泉县志》（同治刻本）卷 5；同治《龙泉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卷首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浦江	县学	光绪《浦江县志》（民国五年黄志璠再增补铅印本）卷 4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庆元	县学	嘉庆《庆元县志》（嘉庆六年刻本）卷 4	
浙江	瑞安	县学	乾隆《瑞安县志》（乾隆十四年刻本）卷 2	
浙江	山阴	县学	嘉庆《山阴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卷 19	
浙江	石门	县学	嘉庆《石门县志》（道光元年刻本）卷 3；光绪《石门县志》（光绪五年刊本）卷 4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松阳	县学	光绪《松阳县志》（光绪元年刊本）卷 3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桐庐	县学	乾隆《桐庐县志》（清钞本）卷 5	
浙江	桐乡	县学	嘉庆《桐乡县志》（嘉庆四年刻本）卷 2；光绪《桐乡县志》（光绪十三年刊本）卷 4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武康	县学	乾隆《武康县志》（乾隆四十四年）卷 4	乾隆九年奉颁
浙江	西安	县学	嘉庆《西安县志》（民国六年重刊本）卷 10	
浙江	萧山	县学	民国《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卷 10 上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新登	县学	民国《新登县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卷 12	毁于太平军
浙江	鄞县	县学	乾隆《鄞县志》（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卷 5	
浙江	镇海	县学	光绪《镇海县志》（光绪五年刻本）卷 10	
浙江	诸暨	县学	乾隆《诸暨县志》（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卷 12；宣统《诸暨县志》（宣统二年刻本）卷 14	乾隆九年奉颁，毁于太平军

References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 – 1785*.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Chen Suzhen. *Chunqiu yu Handao: lianghan zhengzhi yu zhengzhiwenhua yanjiu* (*Chunqiu* and the way of Han: A Research on th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en Suzhen eds. *Zhongguo gudai zhengzhiwenhua yanjiu* (Research on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i Lianbin. *Cong shuji shi dao yuedu shi: yuedu shi yanjiu lilun yu fangfa* (From history of the book to history of read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f reading).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New Star Press), 2017.

- Ding Haibin and Shi Yi. *Qingdai peidu Shengjing yanjiu* (Research on Mukden, the second capital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7.
- Hegel, Robert E. “Book and Print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Studies on Asia Series V*, 1: 1 (2016).
- Jin Taofang. “Manwen Shi ‘Shengjingfu Songci’ de Yishu Tese” (Literary Features of Manchu Poem “Ode to Mukden”). *Manzu yanjiu* (Manchu minority research) 1 (1985).
- Lin Shih-Hsuan. “Huang yi pei du, shi wei di xiang: Qianlong huangdi yu Manhanwen *Shengjingfu*” (Splendid Mukden, the Home of Empireship; Emperor Qianlong and the *Ode to Mukden* in Manchu and Han Version). *Gugong wenwu yueka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for Chinese art) 367 (2013).
- Liu Fengyun. “Diandu Shengjing: qingchao ruguanqian wenhua tixi de goujian” (Inception Mukden: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system in Qing state before 1644).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3 (2016).
- Liu Fengyun. “‘You zhiren wu zhifa’: kang yong qian san di de yongren zhiguo linian” (“To rule through people instead of doctrines”: political culture of rulership for three emperors in High Qing period). *Qiushi Xuekan* (Seeking Truth) 3 (2014).
- Lu Xiuli. “Qianlong yuzhi Shengjingfu banben yuanliukao” (Survey on manuscript of Qianlong’s imperial poem “Ode to Mukden”). *Manzu yanjiu* (Manchu minority research) 1 (2005).
- Lu Yang. *Qingliu wenhua yu Tang diguo* (Literati culture and the Tang empire).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eng Fanyong. “Qingdai Shengjing jiangjun yu peidu jigou quanli guanxi de yanbian” (Evolution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general Sheng jing and second capital organiz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Shehuikexue Jik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 (2009).
- Meyer-Fong, Tobie.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3 (2007).
- Meyer-Fong, Tobie.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Tong Yue. *Qingdai Shengjingcheng* (Mukden in the Qing dynasty). Shenyang: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09.
- Yu Yingshi. *Zhuxi de lishi shijie*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Zhu xi: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Song government in China).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shi sanlian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Zhang Wanxing. “Han man sanshierti zhuanhu yuzhi *Shengjingfu* de yingxiang jiqi dui zhongguo shufashi chonggou de qishi”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calligraphy from Manchu and Han inscribed imperial poem “Ode to Sheng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5 (2009).

Locating Shengjing in Q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 Posting, Circulating and Reading of the Imperial Poem “Ode to Shengjing”

ZHANG Yichi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yc_zhang@ruc.edu.cn)

In Emperor Qianlong’s famous poem “Ode to Shengjing”, which was written during his first imperial tour of the ancestral tombs at Shengjing in 1743, the emperor associates “Shengjing” with three features of the Qing imperial political culture: God’s blessing for the advantageous natural environment, Manchu moral kindness from the pure local customs and etiquette,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inception of Qing state.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poem among officials and literati through administrative and cultural channels, the Qianlong emperor succeeded in disseminating the ideology beyond literary circles and thus ha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This micro case reveals that the High Qing state’s approaches and ability to influence elite consciousness.